

我與許廣平

(本文插圖刊第8頁)

●王映霞

菊花時節初相識

許廣平大姐是我的良師益友，她生前先後與我來往了達四十年之久。她生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（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），比我長八歲，所以我稱她為大姐。我與她第一次見面，是在一九二七年一個菊花盛開的秋天，具體日期為十月四日下午，即她與魯迅從廣州抵達上海的第二天。

在此以前不久，我祖父王二南應上海哈同花園姬覺彌的邀請，在羣治大學任教，便舉家從杭州搬至上海居住，租下了哈同路（今稱銅仁路）民厚南里（今稱慈厚南里）八八〇號全部二樓。祖父見到郁達夫孑然一身，把我們的前樓讓給他作為棲身之處。

這時，我與郁達夫已經相識，尚未結婚。我跟郁一起去看魯迅和許廣平。他們是坐輪船來的，在上海尚未找到固定的寓所，暫居於三洋涇橋的共和旅館。一九五〇年以後，我去找過這家旅館，已經不復存在了。三洋涇橋是愛多亞路（今稱延安東路），江西中路的會合處。旅館是一幢三層樓高、兩個門面寬的磚瓦樓房，坐南朝北。他們住在二樓，房間約有二十平方米，內有兩只小鐵床、一只桌子和幾只椅

子，陳設極為簡單。

許廣平曾經就讀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（後改名為北平女子師範大學），是魯迅先生的學生。所以她對魯迅很崇敬，對他的生活照料得無微不至。就在我們初次見面那天，她不止一次地為魯迅遞烟點火，見到陽光晒到魯迅的臉，她馬上去拉下窗簾。她淳樸老實、精明能幹，個子不高，比我矮，穿陰丹士林布的短旗袍，足登平跟皮鞋。

當時，上海女子已開始流行穿皮鞋，但多數還是穿布鞋。我看了她的平跟皮鞋，非常贊賞說：「你這雙皮鞋很漂亮。」她說：「漂亮倒不見得，却穿得很舒服，因為我是天足，這得感謝我這個倔強的性格。我母親是澳門華僑的女兒，但思想不夠開明。我八歲那年，她要給我纏足，我苦苦哀求，得不到同意。於是我大哭大鬧，拚命反抗，母親沒法，只得對我讓步。如果是三寸金蓮，今天怎麼能穿皮鞋？」魯迅與郁達夫是多年老友，他們海闊天空地聊了一大陣，我們兩個女的有時也插上幾句。他們稱許為密斯許，稱我為密斯王，我和郁尊稱魯迅為「大先生」，許稱魯迅為先生。夜幕降臨時，我們四個人坐黃包車到四馬路（今稱福州路）全家福菜館吃飯，這是一家

本地菜館。第二天上午，郁和我又到共和旅館去看望他們，坐了一會兒，陶元慶和許欽文也來了。

往來無間情誼深

一九二八年春，我和郁達夫結婚後，築小家庭於赫德路嘉禾里（今為常德路八一弄），位於滬西區。魯迅和許廣平則經過北新書店老板李小峯的張羅，租下虹口區景雲里（今為橫濱路三五弄）為住所。我們與他們的住處相隔十餘里，但交通方便，出門就是一路有軌電車，叮叮噹噹地坐上不到一小時，就可以到達他們的景雲里。因此，我們經常去看他們，他們也來看我們，但許廣平沒有單獨一個人來過，因為她已經懷孕了。倘若無人作伴，她獨個兒來往，魯迅總有點不放心。

那時，我們相互請客，習以為常。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，我和郁達夫請魯迅和許廣平在四馬路聚豐園菜館吃晚飯，同時還邀約了柳亞子夫婦、郁達夫的兒媳和青年作家林徵音。他們中，除許廣平的祖籍是廣東番禺外，其餘都是江南人，因而找了聚豐園這家無錫菜館。當時，魯迅與柳亞子兩位先生尚未熟悉，是由郁達夫從中介紹的。

這天，魯迅和往常一樣，談笑風生，他的話富於哲理，又富於幽默感，我們都喜歡聽。對魯迅先生，郁達夫是十分尊敬的，這在他寫的「贈魯迅」一詩中，就可以看出。但是這一天，都可能會有些醉意了，見到許廣平在旁，便對魯迅開了一個玩笑，說：「大先生，你的華蓋運可以脫了罷！」華蓋是天上星星的名字。舊時迷信，認為華蓋星犯命，運道不好，但有了喜事，如結婚、生孩子之類，這個壞運就可以被沖走了。因此，郁一說這句話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許廣平身上，許有些羞意地低下了頭，因為她與魯迅是到上海後才結為終身伴侶。魯迅則哈哈大笑，笑得手指顫抖，連夾着的香烟幾乎要掉了下來。過了一個星期，即十月十二日，魯迅寫了一首七律，那就是著名的「自嘲」，並寫了四句跋語：「達夫賞飯，閑人打油，偷得半聯，湊成一律」。所說「達夫賞飯」，即指這次請客而言。不久，許生周海嬰於橫濱橋醫院（今為第四人民醫院）。之後，我也懷孕了，她送給我不少小孩的衣服，這些多半是為海嬰準備而尚未穿過的。

泥牛入海無消息

一九三三年春末，我們全家遷居杭州，但我每月必來上海一次，為的是向北新書店李小峯領取稅，每次為銀洋一〇〇至二〇〇元。領款後，我就去看魯迅和許廣平。同時又到附近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夫婦所開設的內山書店還書款。郁達夫愛好買書，尤其喜歡到內山書店去，因為那裏可以賒賬。當時，他的叢書已達二萬多冊，後來都被日本侵略軍所盜走。

一九三三年年底，我和郁達夫從杭州來看魯迅和許廣平。我準備了四張虎皮紙，請魯迅給我題首詩。「魯迅日記」同年十二月廿九日有段這樣的記載：「下午映霞及達夫來。」第二天又記：「午飯為映霞書四幅一律」，這就是他的「阻郁達夫移家杭州」一詩。

我每次去時，許廣平都很忙，不是為周海嬰縫製衣服，就是協助魯迅整理資料和謄寫文稿。我問她忙不忙，她說：「忙得很，抄不完的稿件，做不完的家務，比我過去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做訓育主任時還要忙。」許廣平是個「文武雙全」的女性，既能寫一手好文章，又擅長刺繡。他們鐵床帳沿上的花木蟲鳥就是她親手繡出來的，五彩繽紛、栩栩如生。解放後，我去參觀魯迅故居，沒有見到這個帳沿，想必是處理掉了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，魯迅先生溘然長逝時，郁達夫已去了福州，我仍留在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。得知噩耗後，我趕忙來到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去慰問許廣平。他呆在二樓的臥室內，坐在魯迅生前坐慣的舊而大的藤椅裏，滿面愁雲，泪痕斑斑。我向她說了許多安慰話，但沒有什麼用，怎能解除她的悲痛呢？

我早就知道魯迅患有肺病，許多親友包括我們在內，都勸他到醫院治療。宋慶齡還這樣寫信給他，說：「你的生命，並不是你個人的，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！你有保存、珍重你身體的必要。」但是他聽從眾人的勸告，仍以「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，倒不如趕快工作而少活幾年」的奮鬥精神堅持寫文章。倘若魯迅及早治療，他的人生旅程可能不致於這

樣早就打上句號。

抗日戰爭發生後，許廣平留在「孤島」上海，她與鄭振鐸等一起，編輯出版了六百萬字的「魯迅全集」，這是中國第一部「魯迅全集」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佔上海租界，十二月十五日逮捕了許廣平。她大義凜然，堅貞不屈，日本憲兵無可奈何，不得不給以釋放。當時，我剛從新加坡回到重慶，於友人處得知這些情況後，立即給住在霞飛路霞飛坊（今為淮海中路九二七弄）四十號的許廣平寫信，但泥牛入海，音耗杳然，想來她沒有收到這封信。

上海大廈成訣別

魯迅逝世後，遺體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，一九五六年被遷葬於虹口公園（今已改為魯迅公園）。為此，許廣平帶了周海嬰抵達上海，寓居於百老匯大廈（今稱上海大廈）。葬事完畢後的第二天，許叫李小峯通知我到四馬路一家菜館吃飯。

吃了飯，我陪她回上海大廈。她送給我一枚可以掛在胸前的魯迅紀念章，上有魯迅遺像，是金屬製成的，小巧玲瓏，惹人喜愛。我把與郁達夫分手的情況告訴了她。

當夜，華燈初上，她去了北京，我陪送她到北火車站，揮手告別，不勝依依，不料這次竟成了我們的訣別。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，許廣平因心臟病突然發作，逝世於北京。寫到這裏，一個慈祥 and 藹的婦女形象，驀然映現在我的面前，我的眼睛有些潮潤了。大姐啊！我在懷念着你，將永遠懷念着你。